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进程与趋向

文/门洪华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其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之际；中国逐步扩大改革开放之时，也是其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之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国家间关系研究扩展到几乎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其间，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深刻认识到，建设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必然，也包含着现实的必要性。自1987年起，诸多学者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特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再聚焦于“中国特色”的争论，转而致力于“中国学派”建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变得愈加规范与厚重。当然，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正在迎来新的发展瓶颈，这就是如何回归到中国重心，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突破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开创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图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政治思想

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建构应基于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底蕴。在哲学理念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的精神内核，塑造了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包容共生的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中国形成了“德政”“中庸”等政治思想和以“和”为中心的外交哲学，并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国际政治思维。

在政治理念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下大同”理想。这种理想塑造了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开放包容的特质，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的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可相应地为国家行为的准则提供规范。在利益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兼济天下”，反映了朴素的共同利益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理念，到“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最近倡导的正确“义利观”，均体现了共同利益在中国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中的重要性。在安全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

贵”“协和万邦”，不强调武力征服，而是崇尚道德和文化感召的作用。在战略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不战而胜”“以战止战”“上兵伐谋”的境界，统一、安定、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旋律。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道德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品格。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又有时代和国际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演变，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典范。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最根本之点在于其战略思维。建国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判断世界局势的变化，始终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又体现出放眼世界、关注全人类命运的情怀，始终把中国前途与人类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全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和胸怀。概言之，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和平思想。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平发展是世界主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等战略思想，体现了对和平的一贯追求。毛泽东提出“和平为上”的主张，认为世界和平需要各国人民去争取、去斗争。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认为既要扩大国际合作，又要坚持必要的斗争。江泽民强调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运用到国际政治的实践领域。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将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要求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第二，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结合，秉持正确义利观，发展共同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倍加珍惜国家的独立自主，确立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

家关系依据的战略思想，同时关注人类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共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与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把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

第三，始终坚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变革者。鉴于参与创立二战后国际秩序及被排除秩序决策之外的经历，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自联合国的筹划，尤以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为制高点。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观点更加辩证。2005年12月公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第一次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四，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一贯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并强调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随着中国和平发展，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向世界作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同时中国提出并落实和谐世界的思想，堪称是对反霸思想继承基础上的超越，代表着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第五，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人类发展的潮流。中国尤其强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外部世界利益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强调和衷共济、互利共赢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的重要表述。

第六，为国际社会作出中国的贡献。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更多地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从过去专注于自身发展演进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人类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各国应该共同推动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以引进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开端的。1978~1989年是我国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起始阶段，一些西方理论著作在这一阶段被陆续介绍、翻译进来。1989~1999年是大规模引进西方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等国际政治理论流派著作和尝试创立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阶段。期间，西方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大多被介绍进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深受其影响；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学者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涌现了大批相关著述；中国学者尝试建立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相继推出了诸多国际政治理论概论、专论等，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000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进入理性批判和辩证吸收时期。国外译介不再完全局限于美国，英国国际社会学理论、德国社会批判理论、法国历史社会学理论、拉美依附理论被大规模介绍进来；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吸收和应用增强，出现了大批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著述；加重挖掘传统外交文化的力度，注重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孙子、诸葛亮、李鸿章、曾国藩等的外交思想；中国学者在国际战略、国际秩序、时代主题、国际格局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显露特色。概言之，一些中国学者在努力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也注意从中国的视角研究国际政治，尝试建立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如何建构中国学派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讨论的主题之一，并陆续出现了“中国化”“本土化”“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的提法，体现了中国国际政治理论自主性探索逐步增强的趋势。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视为中国特色问题讨论的发端。此后多次国际关系理论会议均以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中国特色作为主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特色问题上的共识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从哲学的高度，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开始更多地使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理论，并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视角和思想。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合流，就建立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基本达成共识。2000年之后，相关讨论转向如

何进行理论创建问题，中国主体意识初步显现，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开始成为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主要内容。与之相伴随，明确反对中国特色的人越来越少，使用“中国学派”说法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众多学者探讨了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这种特色不仅要基于中国基本国情，还要体现中国自身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以梁守德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就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命题，在探讨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学派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王逸舟也指出，“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惟一的执政党……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存在与发展的大环境。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从本质上不仅有别于欧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

其次，学者们深入探讨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在中国现实问题上的解释盲点。门洪华指出，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既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范式体现出解释的乏力。纵观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尽管有诸多清醒和冷静的学者在呼唤和探索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但总体而言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依旧被笼罩在西方理论范式之下，没有深入挖掘和自发弘扬中国的文化理念，反而有丢失文化传统之虞。秦亚青就此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目前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和借鉴，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理论范式还没有出现。

再次，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学派形成的核心要素。秦亚青提出，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是国际政治中国学派生成的必要条件，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就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条件可以促进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对中国的意义等均与此相关，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其他学者则以此为参照指出，中国学者进行国际政治理论创造，离不开中国的实践经验，其根本在于回答中国如何与世界互动这一核心问题。

最后，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历史文化思路。在中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探索中，4种倾向有所凸现出来，这就是以赵汀阳为代表的哲学路线、以叶自成为代表的外交史学路线、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路线和以秦亚青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路线。陈岳则提出了一条融合性的路径，即“完全可以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对成熟的体系框架，以及合理的概念、内涵和原理，但同时又使之具有中国学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环境特点

的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探索的未来方向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有4个基本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衡量，必以后二者为标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初步具备了学科自觉、学派自觉与学术自觉，基本具备了进行独立理论创新的环境，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春天正在到来。与此同时，中国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挖掘非常不够，对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评价尚不全面、不完整，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根基尚不坚实，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科学性、独立性，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中国重心。一个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应该以本国为重心。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以西方为重心，与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积弱相辅相成，与我们对其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分不开，也是与我们对弘扬文化传统不够直接相关。确立中国重心意味着，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弘扬传统哲学、理念和理想，走上本位性的学术创新之路，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贡献中国观点、中国理念、中国理论。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值得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条件。

第三，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将中国历史经验与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结合分析，更深入地挖掘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现象，促成中国理论范式的出现。同时，总结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并超越为现实政策寻找理论依据的阶段，凝练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主张，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内核。

第四，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积极借鉴外国理论，兼收并蓄、融合消化并努力超越，以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看待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作出贡献。^⑤

（作者系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摘自《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原题为《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